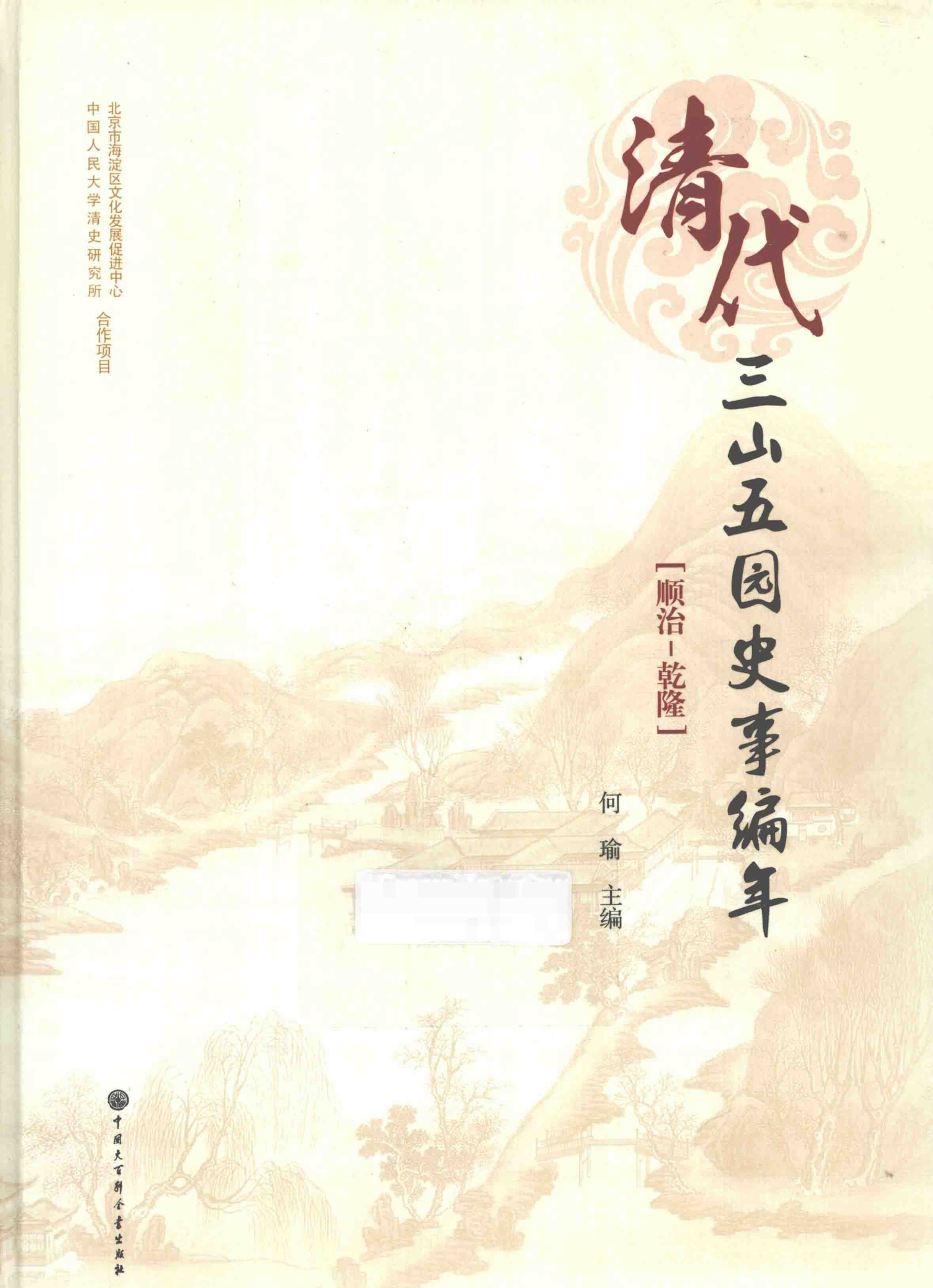




清代

三山五园史事编年

〔顺治—乾隆〕

何瑜 主编

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合作项目



中国古籍出版社

京市海淀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 合作项目
国 人 民 大 学 清 史 研 究 所

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

顺治 - 乾隆

何 瑜 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 顺治—乾隆/何瑜主编.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 1

ISBN 978-7-5000-9294-0

I. ①清… II. ①何… III. ①中国历史—编年史—清代 IV. ①K249.0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1310号

策 划 人 郭银星

责任编辑 程广媛

责任印制 倪 亮

封面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635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43.25

字 数 538千字

印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0-9294-0

定 价 7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编委名单

隋振江 孙文锴 关成启 彭兴业 张宝章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维熙 马俊恩 于佩丽 牛爱忠 方 玥 王言敏
尹 稚 叶亮清 刘耀忠 张 辉 张公政 张渝丽
何 瑜 陈 双 陈 谷 陈名杰 杨念群 周明德
赵 涛 赵世伟 赵立军 高 洁 夏明方 曹宇明
黄兴涛 黄煦明 裴广强 魏 星

凡 例

一、本书主要收录自顺治十三年至宣统三年，其二百五十余年有关三山五园的清朝史记。为明渊源，简要概述自辽金以来香山及玉泉山概况。

二、本书依据之史料，主要取自官书，包括起居注、实录、圣训、方略、会典、内务府则例、方志、文集等，尤其注重已刊和未刊档案。清帝诗文系三山五园史中的重要资料，本书节选、摘录之标准，以记事为主，尤其注重诗中小序及注解。

本书史料取舍力求公允准确，据史直书，全而不滥，精而不缺。为保持历史的原真性，本书在某些地方原文照录了档案史料。

三、本书以帝王为经，以三山五园为纬，凡清帝幸园、回宫、南巡、北狩、东谒、西征和园林建设、园林管理，以及帝后在园起居生活等诸方面的重要史实，均予记录。

四、本书以“政自园出，因园记事”为原则。凡与上述皇家园林有关的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诸方面的重要史实，均予记录。

五、本书以“名随其时”为原则，所涉及人名、地名、爵职等称谓，一律以历史沿革为准。

六、本书收录之文献，一概不作注释。文中除匾额等内容外，一般不加引号。

七、本书记事，年经事纬。各朝以时间为序，以日系事。某些经年跨月的史实，为保持其连贯性，则集中记录。有些重要史实，凡日之不能定者，列于本月；月之不能定者，列于本年；年之不能定者，列于本朝。

八、本书囿于档案史料之现状，个别地方体例不甚统一，如清前之概述、康熙朝之请安、乾隆二十一年记载略详等。

九、本书人名、地名为满、蒙、英、法、俄、日等文字者，均以通用汉译名为准。清代夏历月、日、时，均用汉字书写，公历年、月、日，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本书涉及其他之数字，均用汉字书写。

序 一

北京市在 2009 年 12 月提出了“世界城市”的建设目标，瞄准建设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加快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发展战略，以更高的标准推动首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2012 年 7 月，北京市又提出“推进海淀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建设”的重大决策。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和海淀区有关单位，都积极行动起来，迅速决策，付诸实施。海淀区委、区政府做出决定：用三到五年使三山五园地区环境面貌彻底改观，整体形象全面提升，把三山五园景区建设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中心城市的重要功能区、历史文物保护区、古都风貌代表区和世界高端旅游目的地。此后，在北京市和海淀区各个方面，多次召开有关三山五园的专题论坛、报告会、研讨会、座谈会，诸多专家、学者、园林从业人士及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献计献策，著书撰文，把这一历史文化景区的建设与实现中国梦结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建设的热潮。正是在这一潮流的推动下，著名清史学家何瑜教授编著的《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应运而生。它是时代的产物，社会进步的产物，适应了北京城市建设的需要，适应了建设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的迫切要求。因而必然会受到政府部门、相关单位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我们要建设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什么是“三山五园”？三山五园或五园三山这个词汇，在一百多年前就出现了。清代咸丰十年（1860），鲍源深在《补竹轩文集》中记述英法联军焚毁京西皇家园林时，写道：“九月初，夷人焚五园三山，圆明园内外胜景，悉成煨烬矣。”五园三山，是对京西最著名的五座大型皇家园林的概括。包括哪五座园林呢？最权威的回答当然应由乾隆帝弘历做出。何瑜教授在这部著作中介绍了弘历在乾隆四十六年写的《知过论》，文中写明京西最著名的五座皇家园林是：“畅春园、圆明园以及清漪、静明、静宜三园。”后边三园是三座山园，山即是园，山与园是不可分割的。由此可知，三山五园就是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

三山五园主要是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修建完成的。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建成畅春园，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建成万寿山清漪园，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三山五园的建成，使遍布几十平方里的皇家园林集群，在地域上连成一片，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这组皇家园林的居住、理政、休闲、游览的社会实用功能得到充实和完善。畅春园是弘历供养其生母孝圣皇太后的“太后园”。圆明园起着皇宫大内的作用，是供皇帝上朝和寝居的“御园”。三山园囿是三座行宫，是皇帝游乐赏景的“后花园”。清漪、静明二园距御园很近，弘历只做一日游或半日游，从不留宿过夜；静宜园稍远，一去便是三五日，但是无论到哪座园囿游览，弘历总是坚持“游园不废政务”，

都要问政理事。

与三山五园同时修建起来的京西皇家园林还有圣化寺、泉宗庙、倚虹堂、乐善园、紫竹院、钓鱼台，以及一批皇家赐园和寺庙园林。这些皇家园林都应包括在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之内。

何瑜教授编著的《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使人耳目一新。对这部书的学术成就应予充分的重视和肯定。我认真阅读和反复学习，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这部书是对三山五园研究的深入发展，是新突破、新成果。京西皇家园林集群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要想深刻地理解和认识它，必须由各学科的专家学者携手合作，共同攻关。我们欣喜地看到，各个部门和学科的专家都投入到这项研究中来。哲学、美学、文学、工程学、环境学、景观学、历史学、宗教学等门类研究，都取得可观的成果。但是用历史学家客观的眼光，全面准确地审视和记录三山五园修建、发展、衰落、焚毁、重建的历史进程的著述，还没出现过。何瑜教授的这本书在此方面取得了全新的突破。这本书以“政自园出，因园记事”为原则，凡与三山五园有关的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重要史实，均予记录。阅读了这些有根有据的历史篇章，使人们加深了对园林认识的历史感，这些皇苑不是单纯地供人们休憩、赏景和游乐的天然或人工的美丽景观，而是与全国的政治动向和各民族人民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三山五园的兴衰史几乎摹写了大清帝国的盛衰史。这部书将读者对三山五园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第二，这部书使我们对三山五园的“皇家属性”，有了更深入、更明晰、更突出的认识。何瑜教授在确定本书的编辑方针时，突出了“以帝王为经，以三山五园为纬”的原则。凡清帝幸园、回宫、南巡、北狩、东谒、西征和园林建设、园林管理以及帝后在园起居生活等诸方面的重要史实，均予记录。在三山五园内发生的这些巨大的、微小的、具体的历史事件，勾画出了清代皇家宫廷文化的主体面貌，也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与生动。透过这数千条耐人寻味的记载，让我们一点一滴地积攒起来对京西园林的皇家性质的认识。皇帝本人便是皇家园林建造的发起者和主持者。乾隆帝弘历就是一位高水平的造园艺术家。他亲自规划和主持完成了每一座皇苑的建设。这些园林体现了弘历的文化理念。比如，在园林设计和建造中，突出地体现着他的“重农兴穡”、“重视藏传佛教”等基本国策和治国理念。他先后修建了圆明园的北远山村、多稼如云，清漪园的耕织图，静明园的溪田课耕等，都是为了“观稼验农”。清漪园后山的须弥灵境和四大部洲、静宜园昭庙的建设等，都表明了弘历对蒙藏民族进行团结和怀柔的统战政策，他还与班禅共同参加了昭庙的开光典礼，被奉为民族团结的佳话。再如，每座园林都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从景观布局、叠山理水、建筑名称、花木配置到殿堂内外阵设，到处都诠释着传统的文化思想和美学观念。又如，京西园囿具有鲜明的皇家建筑特点，高大雄伟，气势磅礴，鲜丽华贵，材质考究；同时也吸取了江南园林精巧雅致、舒适宜居的风韵。弘历在南巡时命画师将江南的园林美景绘制成图，创造性地移建到三山五园中来，以体现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最高统治思想。这也使全国各地最著名的园林设计建设成果在京城近畿展现和闪光，使三山五园成为全国最高造园艺术水平的集大成者。

第三，这部书所列举的大量史实，使我们清楚地观察到，三山五园的修建对京西海淀香山一带的社会状况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彻底改变了本地区闭塞落后的农村面貌。京西御园起着皇宫的作用，皇帝长驻，朝臣云集，使这里成为紫禁城外又一个全国政治中心，许多涉及全国的重要问题在这里决策，对清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保证皇帝的安全和征战全国的需要，在三山五园周围建立了“京旗外三营”，即圆明园八旗护军营、香山健锐营和蓝靛厂外火器营。外三营有官兵一万余人，连同家属达四万余人。这大大地改变了当地居民的民族和职业构成，提高了人们的富裕程度和文化水平。由于皇室的高标准要求，以及富甲天下的权臣贵胄云集于此，社会购买力空前提高，于是便诞生了著名的海淀等京西三镇和一大批商业中心。海淀一带的文化事业也空前繁荣。皇家园林就是皇家图书馆、皇家博物馆和皇家美术馆。清代几位皇帝还亲自组织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巨型古籍的编辑出版工作；他们本人也是著作等身。在这里居住着无数位全国知名的学者和文学艺术家，他们创作的高水平的学术和文学艺术作品卷帙宏富，灿若星空。曹雪芹的《石头记》、纳兰性德的《饮水词》、顾太清的《天游阁集》等传世的文学精品在这里写成。所有这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内容十分丰富，它按时间顺序逐次记述了与三山五园相关的历史事件。我阅读后有多方面的收获和感慨，以上只是记述了我的几点突出感受。我还要继续阅读学习，希望进一步增进对三山五园的认识和理解。我相信开卷有益，我希望有更多的读者朋友在阅读本书时获得教益。

祝贺本书出版！

张宝章
2013年6月

序 二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也是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八百多年的建都史，积淀了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以“三山五园”为代表的清代皇家园林，就是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满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长期以狩猎为生，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入关以后，清统治者忍受不了北京夏天的炎热和潮湿，准备择地筑城避暑。顺治七年（1650）七月，摄政王多尔袞谕令户部加派直隶、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河南、湖广、江西、陕西九省地丁银 249 万余两，“输京师备工用”。同年十二月，多尔袞病死，筑城避暑的计划被搁置起来。由于连年战争，库款支绌，“终世祖之世，岁支常浮于入”。无力兴建皇家园林，仅将明代的南苑稍加修葺，“用备蒐狩”。

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二十二年（1683）台湾归顺，清王朝的统治得到巩固，经济也有所恢复。一次，康熙来到北京西北郊的丹棱泖，“饮泉水而甘”。于是，在海淀明代皇亲武清侯李伟清华园的旧址上兴建了清代第一座皇家园林——畅春园，用以“避喧听政”。由于这个缘故，一些王公大臣和康熙已成年的儿子们纷纷在畅春园附近兴建自己的住所。四十六年（1707），康熙将畅春园北一里许，地名华家屯的一块土地赐给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禛。胤禛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建成一座小园。四十八年（1709），康熙为之题额曰：“圆明”。这时的圆明园，占地面积约 600 余亩。六十一年（1722），胤禛即位，这就是雍正帝。雍正二年（1724），在圆明园原有“亭台邱壑”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建设轩墀，分列朝署，俾侍值诸臣有视事之所。构殿于园之南，御以听政。” 全国面积增至 3000 余亩，有风景建筑组群 28 处。从此，圆明园成为清代五朝皇帝（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经常居住和向全国发号施令的政治中心。

乾隆即位的时候，清王朝已经建立了将近百年。国家的统一、政权的巩固，特别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乾隆的大兴土木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乾隆认为，“泉货本流通之物，财散民聚，圣训甚明。与其聚之于上，毋宁散之于下”。他以“物给价，工给值”的方式，将国库的存银散到民间。从乾隆三年（1738）开始，他就大规模地修建圆明园。九年（1744），建成圆明园四十景。命宫廷画家唐岱、沈源绘制成图，乾隆逐一题咏，命工部尚书汪由敦书写，按照左图右书的传统，装裱成上下两册，题名《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乾隆在《圆明园后记》中踌躇满志地写道：“圆明园规模之宏敞，邱壑之幽深，风土草木之清佳，高楼邃室之具备，亦可称观止。实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接着，又在圆明园的东邻修建长春园，并沿着长春

园的北墙修建一组欧式建筑——西洋楼。后来，又将圆明园东南邻的两座赐园并入，称为绮春园，从而形成了圆明三园的格局，占地面积5200余亩。与此同时，又先后改建和扩建了玉泉山的静明园、香山的静宜园，并借疏浚西湖的机会兴建了万寿山的清漪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山五园”。

“三山五园”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的优良传统，把建筑、山水、花木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个各具特色、富有诗情画意的景区。“虽由人造，宛自天开”。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又一高峰期的杰作，而且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结晶。它和紫禁城内的皇宫遥相辉映，成为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重要组成部分。

1856年，英法两国政府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在对“三山五园”进行疯狂抢劫之后，又于10月18日将“三山五园”的建筑野蛮地纵火焚烧。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文化浩劫，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场文化浩劫。英法侵略者的罪行，遭到了世界进步舆论的谴责。法国大作家雨果在《致巴特雷上尉的信》中怒斥英法侵略者是“两个强盗”。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三山五园”不断遭到破坏。畅春园的遗物，除了路边的两座庙门之外，早已荡然无存。静明园二十八景中的个别建筑虽已得到修复，但其余部分则大多残破。长期以来，圆明园遗址一直受到国人的关注。1980年10月18日，圆明园罹劫120周年之际，以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为首的1583人联名发出了《保护、整修暨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198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规定要在本世纪内建成圆明园遗址公园。2000年8月1日，北京市市长办公会讨论通过了《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不久，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但是，规划提出的恢复圆明园古建10%，至今没有落到实处。圆明园遗址西部，依然满目荒凉。唯一保存了皇家园林风貌的就是光绪年间慈禧挪用海军经费在清漪园遗址上重建的颐和园。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颐和园遭到破坏。1902年，慈禧对其再次进行修复。清王朝灭亡后，颐和园先后在北洋军阀、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度过了二十余年的艰难岁月。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不断投入资金，将这座以湖光山色著称的世界名园修葺一新。1961年，国务院公布颐和园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以来，又先后修复了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的苏州街、澹宁堂、景明楼、耕织图等建筑。1998年，颐和园以“世界几大文明之一的有力象征”的高度评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一百五十年来，“三山五园”的不同命运清楚地告诉我们：对皇家园林最好的保护就是整修。废墟的寿命是短暂的，它只不过是人类文化遗产从有到无的过渡形态而已。

令人高兴的是，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2年7月，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首次将“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建设作为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项目写入报告。我认为，“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三山五园”的兴废和三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三山五园”的再创辉煌，不仅是古都北京向世界人民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而且必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象征。

为了建设好“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必须加强对“三山五园”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三山五园”的资料作过全面、系统的整理，我们对“三山五园”的历史和现状，往往是若明若暗，甚至是漆黑一团。何瑜教授及其团队所编著的《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以清代档案、官书、方志、御制诗文和私家著述为依据，按“政自园出，因园记事”和“以帝王为经，以三山五园为纬”等原则，勾勒出清王朝兴盛衰亡的历程和皇家园林发展变迁的轨迹。为我们研究“三山五园”的历史，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它的问世，必将进一步推动“三山五园”的研究。我祝贺本书的成功，并期待着更多的佳作问世。

王道成
2013年6月

自序

北京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是一座拥有三千余年历史、八百五十余年建都史的文化名城。综观世界各国的古都文化，虽特点各异，但均为该国历史文化的经典名片，如埃及之开罗、希腊之雅典、意大利之罗马、英国之伦敦、法国之巴黎等等。如果说汉唐威仪在西安，南宋气质在苏杭，那明清的风采无疑就在北京。作为五朝故都的北京，皇家园林则是其历史文化最大的特点和亮点。

清代的三山五园，包括万寿山（清漪园，1888年改名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畅春园（今北大西门外）、圆明园（包括长春园、绮春园、熙春园、春熙院）等皇家园林，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课题，涉及历史学、建筑学等诸学科，内容包括政治制度、宗教祭祀、礼仪风俗、饮食服饰、音乐戏曲、诗词楹联、绘画装饰，以及中外交流、后宫生活、园林管理等诸方面。

三山五园称谓之源

“三山”一词出现较早。明天启年间，即有太仆寺少卿管“三山”之事。清顺治年间设有提督三山员外郎一职。但此时的“三山”，并非今日“三山五园”的“三山”。“三山”中的香山、玉泉山，称名甚早，在辽金时已名扬天下。到乾隆十五年（1750），改瓮山为万寿山后，才出现今日“三山”之名。十八年（1753），乾隆帝作《凤凰墩放舟自长河进宫》一诗，其中有“四面波光动襟袖，三山烟霭护壶州”之句。三十六年（1771），又有“内务府大臣四格兼管万寿山三山及织染局事务”之谕。

“三园”之称，略晚于“三山”。顺治十三年（1656），玉泉山行宫命名为澄心园，康熙三十一年（1692），改称静明园；乾隆十一年（1746），香山行宫命名为静宜园；十六年（1751），万寿山行宫命名为清漪园，并设总理园务大臣，兼管静明园、静宜园事务。至此，“三山”、“三园”的称谓便频现于官书及官员之口，而且二者即可单独亦可重复使用，如可称万寿山清漪园、香山静宜园或万寿山、静明园等。

“三山三园”之外，另有“圆明三园”与“圆明五园”之说。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帝日后“息肩娱老”之长春园建成；三十三年（1768），并大学士傅恒之春和园，定名为绮春园；合之圆明园，即为“圆明三园”。长春园、绮春园置总领，隶属于圆明园总管大臣。嘉庆帝在《绮春园记》中言：“圆明、长春二园之东南即绮春园，名虽三而实则一，中有门墙之隔耳。”意思是说“圆明三园”实为一个大御园。乾隆三十二年（1767）、四十七年（1782），熙春园、春熙院分别并入圆明园，即形成所谓“圆明五园”。至此，由圆明园总管大臣管辖上述五园，不再移行奉宸苑，直接隶属于内务府管辖。

“圆明五园”始终没有成为固定的指称，且畅春园、三山三园和圆明园（包括三园或五园），

在清代长期分别由三个总管园务大臣管理。故咸丰十年（1860），侍读学士鲍源深在记录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使用了“五园三山”的称谓。为什么“园”在“山”之前？那是因为清帝园居理政的中心在园而非在山。如果过于强调存在仅二十二年的“圆明五园”，或不能以重复计算为由，就忽略了曾是康熙帝御园和乾隆帝奉养皇太后的畅春园，这在以孝治天下的大清王朝，是万万不可能的。但清亡后，民间用顺口的“三山五园”来替代“五园三山”，泛指早已名不副实的京西皇家园林，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清帝园居理政的时间分析

虽说清承明制，但清朝统治者在继承传统方面，又有很多重大的突破和发展。园居理政、宫苑布局等，即其一端。在沿袭六寝六宫或前宫后寝制度上，清帝与明帝就有很大的不同。有明一代，有两代帝王因不住乾清宫而惊动朝野：一为正德二年，武宗迁居豹房；二为正德二十一年，嘉靖皇帝以“壬寅宫变”为由，迁居西苑永寿宫。所以，明帝系宫居理政，且没有必要建设庞大的宫殿园林系统。

古人喻紫薇星垣为皇帝的居处，故皇宫又称“紫禁宫”，但在清帝心目中，圆明园等与紫禁城是等同的，同为天子“御政之所”。如康熙、乾隆二帝就曾多次表示，“肇建（避暑）山庄，为时巡展跸，临朝御政之所”，“如紫禁之制”。雍正帝也声称：“朕在圆明园与宫中无异也，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嘉庆帝则明言：“朕驻蹕圆明园，即系紫薇禁地。”正因为如此，自顺治帝亲政后于南苑园居理政始，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离开颐和园止，九朝清帝园居理政时间长达二百四十余年。这与明朝和历代汉族皇帝的宫居理政，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历朝清帝的园居理政时间到底是多少呢？

顺治帝从亲政到去世的十年间，他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居住于南苑，有时甚至长达一年。

康熙帝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二月以后，便年年到畅春园，直至病逝，其年均园居理政达150余天。其中，自正月初二日即到畅春园居住的年份不下十次，迟至腊月二十五日及以后回宫的有七次。如果联系到康熙帝一生多次北狩木兰、南巡江浙、东谒祖陵、西巡五台，以及亲征塞外等一系列活动，康熙帝园居理政的时间要远超过宫居理政的时间。

雍正帝自雍正三年（1725）八月始园居理政，年均驻园210余天。如，雍正十一年的355天，他便有282天生活在圆明园里。

乾隆帝的活动范围较大，除紫禁城、避暑山庄、南巡、东巡等之外，亦是园居的时间更长一些，年均驻园120余天。如，乾隆二十一年（有闰月）共393天，乾隆帝在圆明园就有168天。

嘉庆帝年均驻园160余天。

道光帝年均驻园260余天。如，道光二十九年（有闰月），其园居时间高达354天。直至翌年正月，病逝于圆明园慎德堂。

咸丰帝在咸丰十年（1860）八月初八日北上热河前，驻蹕圆明园七年，年均驻园210余天。

殿试传胪和许多重大宴会等，原来多在宫内举行，乾嘉以后也多移至圆明园举办。如从雍正初年始，每年上元（正月十五）前后，均要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办盛大宴会，赐宴王公大臣，并举办礼乐、摔跤及烟火等活动。乾隆初年起，每年新正必在圆明园举行“上元三宴”，即正月十四日宗亲宴、十五日朝正外藩宴、十六日廷臣宴。其中，朝正外藩宴是宴赏来京朝贺新正的各族王公、

首领及外国来使，大学士、内大臣等也同赴此宴，席间还表演庆隆舞、喜起舞等。

乾隆五十四年（1789），和孝公主下嫁和珅之子丰绅殷德，乾隆帝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行初定礼，并宴赏皇子、王公大臣和额驸等人。

乾隆帝八十整寿时，朝鲜、安南、暹罗、琉球、廓尔喀五国遣使朝正庆贺，乾隆帝在圆明园宴请各国使臣，并命人带领五国来使游览圆明园。

嘉庆二年（1797），嘉庆帝的万寿节，乾隆与嘉庆父子同御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皇帝率皇子及王公大臣等于太上皇帝前行礼。礼成后，父子同御同乐园赐王公大臣宴。

道光七年（1827），清军平息西北张格尔叛乱。道光帝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赐宴凯旋将士。翌年五月，又在静明园廓然大公殿廷讯张格尔。

咸丰十年（1860），咸丰帝在圆明园庆贺三十寿辰，并在正大光明殿接受百官朝贺。同年，清廷亦在正大光明殿举行钦定金榜的传胪大典。在勤政殿召见殿试阅卷大臣，钦定新进士甲第，一切礼仪均与紫禁城太和殿同。

其余常朝视事、御门听政、翰詹大考、勾决人犯等例行政务以及重大的外事活动，包括接待葡萄牙、荷兰、英国使臣等，均在圆明园中举行。可见，以圆明园为核心的三山五园，在清朝的政治地位是何等重要。

清朝的皇帝为什么喜欢园居理政

有人说是清帝受了儒家文化，尤其是天人合一理念的影响；还有人说是满洲人不适应北京夏天的炎热，追求享乐。这些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不甚准确。其实满洲统治者和我们今人一样，都追求一种宜居的生活。渔猎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民族性格及文化不同，他们不愿受过多的羁绊和约束。前者是驰骋在马背上才有安全感，而后者在高墙大院内才有安全感。

康熙帝在《畅春园记》中阐述了他建园的原因：

一是，临御以来，日夕万机，罔自暇逸，久积辛劬，渐以滋疾。于兹游憩，清风徐引，烦疴乍除。（宜祛病养生）

二是，驻蹕于此，能临陌以悯胼胝，开轩而察沟洫，宛若禹甸周原，在我户牖也。（宜察气候民生）

三是，可只奉颐养，游息于兹，承欢爱日，有天伦之乐也。（宜居宜孝）

雍正帝在《圆明园记》中，更详细地道出了园居的好处，他写道：

恭迓銮舆，欣承色笑。庆天伦之乐，申爱日之诚。花木林泉，咸增荣宠。（宜孝）

宜宁神受福，少屏烦喧。而风土清佳，惟园居为胜。（宜居）

构殿于园之南，御以听政。晨曦初丽，夏晷方长，召对咨询，频移昼漏，与诸臣相接见之时为多。……昼接臣僚，宵披章奏，校文于樨，观射于圃，燕闲斋肃，动作有恒，则法皇考之勤劳也。（宜政）

若乃林光晴霁，池影澄清，净练不波，遥峰入镜，朝辉夕月，映碧涵虚。乘几务之少暇，研经史以陶情，拈韵挥毫，用资典学。（宜学）

至若凭栏观稼，临陌占云，望好雨之知时，冀良苗之应候。则农夫勤瘁，穡事艰难，其景象又恍然在苑囿间也。（宜观农）

春秋佳日，景物芳鲜，禽奏和声，花凝湛露，偶召诸王大臣从容游赏，济以舟楫，饷以果蔬，一体宣情，抒写畅洽，仰观俯察，游泳事宜，万象毕呈，心神怡旷，此则法皇考之亲贤礼下，对时育物也。（宜亲贤）

不求自安而期万方之宁谧，不图自逸而冀百族之恬熙。庶几世跻春台，人游乐国，廓鸿基于孔固，绥福履于方来。（宜绥靖万方）

以上种种在极度封闭、殿宇巍峨的紫禁城中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做到的。

如果我们再深入探讨，就会发现：清朝统治者，尤其是在康雍乾三帝身上所体现出的“大中国”的理念。

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发布了《南巡记》，总结他即位五十年来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

“西师”主要是指乾隆时期两次进军伊犁，最后平定准噶尔蒙古的战争。清前期，准噶尔在战略全局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武力强劲的准噶尔部雄踞西北，其兵锋所指，一是南向西藏，挟持达赖和班禅两个大喇嘛以号令众蒙古，一是东向喀尔喀蒙古和漠南蒙古以完成蒙古统一大业。对清朝来说，准噶尔不是肘腋之患，而是心腹大患。所以乾隆的“十全武功”里竟有七次——两次金川之役、两次平准之役、两次抗击廓尔喀之役以及回部之役都与西藏和蒙古有关。

康熙在位期间南巡六次，乾隆法祖，同样南巡六次。“南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到南方巡视。“南”者，特指华夏文化荟萃的江浙两省。因为江浙士人领袖对清廷的态度，关乎整个汉族的人心向背。所以，康乾二帝六下江南，虽有游山玩水之心、关切民生之愿，但主要还是关注如何控制千倍于满洲人口的汉族人民。

除西师、南巡之外，还应加上北狩，即木兰秋狝大典。乾隆帝在《避暑山庄百韵诗序》中，阐释了康熙兴建避暑山庄的意旨，即：“我皇祖建此山庄与塞外，非一己之豫游，盖贻万世之缔构也……凜天威，鉴前车，查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业，惩晏安之怀，所全者大，则其小者有不必修矣！”故自康熙二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的139年中，历朝清帝共举行木兰秋狝105次。

清朝入关以后，在统一边疆的重大问题上，满洲统治者往往与汉大臣观点不一。如康熙时，施琅收复台湾后是弃是留，众汉官多言弃，康熙帝则采纳少数人意见，坚持派兵留守；康熙五十四年（1715），准噶尔灭拉萨汗，攻占西藏，清廷派军收复西藏，结果全军覆没。以李光地为首的汉大臣主张与准噶尔划界分疆，康熙帝不认同，坚持派十四子允禵率师驱准保藏，最终获得成功。此外，在平定三藩、征讨噶尔丹、北上抗击沙俄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体现出康熙帝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

乾隆时，准噶尔内讧，乾隆帝也是力排众议，坚持出兵打败准噶尔，统一西北边陲。这些事例都反映了满洲统治者天下观、大九州的战略思维，与汉人君主中原思想、小九州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儒家思想中的华夷之辨，其强调的主要是帝王的至高至尊，是华夏文明的无与伦比。而夷狄不过是仰赖天朝恩泽的化外之邦，所以得其地不可耕，得其民不可养。同时，对夷狄的战争只意味着资源的耗费，儒家的理念是开疆拓土非圣主之所为。

正是因为有“大中国”的观念，所以，以满洲统治者为首的清王朝，素有“马背上的朝廷”之称。如康熙皇帝在位61年，一生巡幸多达203次。

巡狩是历代帝王的重大政治活动，驾出巡幸，要别造宝印携行，加“行在”字样。内外大臣的奏

章由内阁汇齐，三天一送行在。故巡狩不是娱乐游玩，而是皇帝雄视八荒、顾驭四海、统治天下不可或缺的一项政治内容。其中，包括观风整俗、考察官吏、检阅武备、祭祀方岳、拜谒陵寝、赈灾恤荒、治理河工海塘、体察民情等等。巡狩期间照样临朝理政，其行在实际就是一个移动的“龙廷”。

那“马背上的朝廷”与三山五园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以乾隆帝一生的主要巡幸活动来看，其四次东巡盛京：两次自圆明园启銮，一次自宫中，一次自热河。六巡五台山：其中两次自宫中启銮，一次自静宜园启銮，余三次均自圆明园启銮，六次中五次均回銮圆明园。六次南巡：因为正月出发，故均自宫中启銮，但六次回銮均回至圆明园。五十二次秋猕木兰或幸避暑山庄，则均从圆明园启銮，再回銮至圆明园。由此可见，三山五园实际上等于清王朝治理天下的大本营。

三山五园——一部浓缩的大清史

三山五园是集中国古典园林之大成的万园之园，亦是一部浓缩的大清史。以往，我们多关注清朝盛世时的三山五园，但晚清时三山五园是什么样子？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的三山五园，是否与乾隆盛世时一样？

答案是否定的。三山五园与清王朝的盛衰是相辅相成的。其衰败实自畅春园始。乾隆四十二年（1777），孝圣皇太后病故后，畅春园即成为闲园。其后，护军撤换，编制锐减。到道光帝即位时，园内已是“殿宇墙垣，多就倾敝，池沼亦皆湮塞”。道光末年，正阳门箭楼失火，其重修所需的“连檐进深通长三丈四尺四寸”的大木柁，因“无处购办”，而将早已“墙垣倾圯”的畅春园主殿九经三事殿拆毁，以备正阳门工程应用。可见，此时的畅春园已成废园。

至于帝王“散志澄怀之所”的清漪、静明等园，其命运又如何呢？史料记载，嘉道以后，不仅清帝巡幸三山次数逐朝减少，而且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始，三园的编制与陈设也大规模缩减。如二十三年（1843），“由静宜园交清漪园库贮陈设一万四千八百四十七件，三园撤交圆明园等处陈设二万七千九百六件”。

道光年间，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清廷财政入不敷出，即使将京外的行宫大部撤废，压缩万寿山等三山开支，主要维持圆明三园的运转，也是捉襟见肘。如二年（1822），清廷的核心衙门如意门内军机处值房，竟出现“椽柱糟朽倾斜，瓦片脱落，墙身鼓裂”的现象。而圆明园附近的军机章京值房，则“倾塌愈甚，难以栖止”，但却无钱修理。最后，这个本应由国家正项出资修缮的办公处所，竟由在岗章京饭食银项下扣支，分十年还清。此外，十二年（1832）闰九月，圆明园还发生了镶红旗百余名护军因无钱购买衣帽，而向大有庄米铺违禁借贷的事件。

“一叶落知天下秋”，三山五园的盛衰史，不仅开拓了清史研究的新视野，更是一部古为今用的资治宝鉴。今天，抢掠和火烧三山五园的英法联军，早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上万件从三山五园遗失的中华文化的瑰宝，仍散失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她是园殇，更是国殇，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痛。古人云：“知耻而后勇。”如何从三山五园的衰落中，汲取更多的借鉴，以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大业，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是为序。

何 瑜

2013年6月于北京什刹海畔

目 录

序 一	1
序 二	4
自 序	7

清以前时期

辽代

北辽建福元年	3
--------------	---

金代

天会年间	4
大定二十六年	4
明昌元年	4
明昌四年	4
明昌六年	4
明昌年间	4
承安元年	5
承安三年	5
承安四年	5
承安五年	5
泰和元年	5
泰和三年	5
泰和七年	5

元代

中统二年	6
至元年间	6
皇庆元年	6
延祐六年	6
天历二年	6